

馬來西亞巴冬潮汕話陰上調的 方言融合與條件變讀*

邱克威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

馬來西亞柔佛州巴冬漁村的潮汕人包括原籍揭陽、澄海與潮安。巴冬潮汕話經過百餘年的方言融合，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共同聲調系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陰上調值的特殊變調方式，即在詞彙末字的陰上本調原本的兩種方言變體[21]與[53]融合而成條件變讀；前者在前字高降調或中升調之後出現，後者則在前字低降調或中平調之後出現。如此則形成連讀字組中的前後調值的異化現象。

關鍵詞：馬來西亞潮汕話、語言接觸、方言變異、條件變讀

1. 緒論

連讀變調是漢語方言音系研究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劉俐李 2002），而王洪君（1999: 250-254）、李小凡（2004）都曾對其中類型與規律做過相當全面而系統的分析。尤其王洪君根據二字組變調的條件提出三種類型特徵：「自身交替式」、「鄰接交替式」、「特徵延伸式」；並指出「自身交替式」屬於「閩方言多用」，這種類型是指「某字的單字調進入連調後不管鄰接條件如何，都以自身調型為條件發生調型的變化」；而「鄰接交替式」是指某

* 特別感謝洪惟仁教授審閱初稿並給予非常寶貴的修改意見。

字的單字調以同一連調域中鄰接字的單字調為條件而發生交替，且這一類型存在於「除閩方言、北部和中部吳方言外的所有方言」；至於「特徵延伸式」，則與輕讀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陳寶賢（2010）全面歸納閩南方言的連讀變調特徵，發現：閩南方言的變調方式除了自身交替式外，還有鄰接交替式。而閩南方言中的「鄰接交替式」特徵體現在：

前字變調分化以後字聲調為條件，主要受後字調頭高低制約，個別情況下兼受調尾高低制約；前字變調調值高低與後字相近或相反。

陳寶賢（2010）提到這樣的連讀變調「反映了協調調值高低的要求」。¹

不論如何，王洪君、陳寶賢談的主要是連讀變調的前字變調，而李小凡（2004）另外還提到蘇州方言一種特殊的變調方式，即前後字都變調的情況，如「陰去[512]+陽去[231]」的連讀變調類型有三種：[52 + 23]；[52 + 21]；[44 + 21]。他指出：

連讀式的漂移使人們難以求得「從單字調到連調的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應該承認，此類連讀變調的性質已經發生了異化，不可能再用同一套語流音變規則來分析。

本文所分析的馬來西亞柔佛州（Johor State）巴冬（Parit Jawa）漁村的潮汕方言變調形態，與上述討論的類型有同也有異，體現出特殊的變調方式。

巴冬漁村屬於馬來西亞柔佛州麻坡縣（Muar District）管轄，主要由原籍揭陽、澄海和潮安的潮汕方言族群構成。當地潮汕方言在不同次方言相互融合下，形成了一種較特殊的陰上調的連讀變調形式，即後字變調分為[53]與[21]二種調值；而從前字條件來看，則前字高降調或中升調，後字唸[21]；前字低降調或中平調，後字唸[53]。

¹ 陳寶賢（2010）雖然基本承認是「反映了協調調值高低的要求」，但其中的現象卻有些複雜性，因此還指出「這並不意味著這類變調完全是協調調值高低的結果」。

結合陳寶賢（2010）、李小凡（2004）對連讀變調規律的分析，巴冬潮汕話的連調式雖然與閩南方言中的「鄰接交替式」有些類似，包括「協調調值高低」的現象，但卻是後字變調，而非前字變調。至于蘇州方言的特殊連調式，其中雖然同為後字變調，但卻未看出是屬於明顯的「協調調值高低」的結果；同時巴冬潮汕話的連調式的不同變調調值是有條件分化的，而非蘇州方言的一詞多音現象。

然而，正如李小凡對蘇州方言內特殊連調式的分析所提出的意見，巴冬潮汕話的這種特殊連調式也同樣需要不同的語流音變規則來分析，包括解釋其變調的原因。

2. 巴冬潮汕話聲調

馬來半島西海岸沿岸由南至北遍布著眾多大小不一的潮汕漁村，中部地區的漁村主要由原籍澄海人構成、北部則主要為原籍普寧；而且其中同鄉同宗的占多數（邱克威 2017b）。至於南部則成分較複雜，包含原籍揭陽、澄海的潮汕漁戶。²

馬來西亞柔佛州的巴冬漁村，馬來地名 Parit Jawa，意即「爪哇港口」；根據官方論述，相傳 19 世紀從印尼來的數十名爪哇人在此開墾落戶。因此中文地名又譯為「巴力爪哇」。而「巴冬」地名則源於馬來語 *padang*——意為平地——的潮汕音譯。華人在此定居肯定已百年以上，位於港口的一座清水祖師——「翠美古廟」，樑上懸掛的橫匾年款為「光緒丁丑年」（1877）。³這裏的漁戶數十家，基本為潮汕人，以原籍揭陽人最多，次為原籍澄海人；此外還有巴冬大街經營生意的原籍潮安人。

² 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劃分有其特殊性。首先，以原籍潮汕地區的華人統稱為「潮州人」，潮汕方言則統稱「潮州話」；其次，以原籍福建閩南漳泉地區的華人統稱為「福建人」，漳泉地區的方言則統稱「福建話」。本文則使用符合學界的一般論述，稱「潮汕」、「閩南」。

³ 根據《叻報》1895 年 10 月 8 日的報導，巴冬漁村當時主要漁戶為原籍同安人，約三百餘人，但因一場瘟疫盡數搬離。至於潮汕人，則根據口述，最晚於 20 世紀初已在當地落戶捕魚。這就能解釋何以閩南人所奉祀的「清水祖師」在當地會由潮汕人來管理。

我們發現在巴冬漁村潮汕話各次方言間的相互接觸下，聲調與韻母都產生了變異，比如原籍澄海與揭陽方言之間閉口韻尾上存在差異，於是巴冬潮汕話因相互接觸而產生了韻尾-m、-p 與-ŋ、-ʔ之間的自由變體，舉例如「心」可唸[sin³³]或[sim³³]，又「十」也可唸[tsaʔ⁵]或[tsap⁵]。

邱克威(2017a)曾提出馬來西亞漢語方言聲調接觸變異現象的特殊性，其云：「根據目前調查方言之間接觸下的音系變異中，聲調系統的變異是比較突出的。」因此巴冬潮汕話的變異形態最突出的還是其聲調變異，尤其陰上調的變異。

澄海、潮安與揭陽方言之間聲調的差異主要在陰上調，即前二者為高降調[53]，後者為中低降調[31]。⁴而巴冬潮汕話的陰上調值變異則非常特殊，即單字音一律為高降調[53]，但在複音詞的後字則分為[53]與[21]二種調值。二者互為條件變讀，即前字調的高低決定後字調的高低：前字高降調或中升調，則後字唸[21]；前字低降調或中平調，則後字唸[53]。

這樣的變異形態存在於整個巴冬漁村的潮汕人族群，不論年齡層與原籍次方言。根據邱克威(2017a, 2017b, 2018)所調查的馬來西亞各地漢語方言相互接觸下音類的變異現象，基本上都呈現為方言變體共現，屬於自由變讀形式；但巴冬漁村潮汕話則不然，兩種調值間相互疊置並演化為條件變讀關係，而且僅在複音詞的後字出現，其單字音則固定為[53]調值。

本文一共調查巴冬漁村六位潮汕話發音人，年齡層介於 20 至 70，而且分屬於不同的原籍次方言區，即包括原籍揭陽、澄海、潮安。六位發音人基本資料如下：

⁴關於潮汕各次方言的聲調系統，參看林倫倫(1995, 2015)的研究論述。為了討論方便，將澄海、潮安與揭陽方言的聲調系統列表於此(林倫倫 1995)：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澄海	33	55	53	35	212	11	2	5
潮安	33	55	53	35	213	11	<u>21</u>	<u>44</u>
揭陽	33	55	31	35	213	11	2	5

表一 巴冬漁村六位潮汕話發音人基本資料

發音人			
發音人①	男	72歲	原籍潮安
發音人②	男	62歲	原籍揭陽
發音人③	女	61歲	原籍澄海
發音人④	男	52歲	原籍澄海
發音人⑤	女	39歲	原籍揭陽
發音人⑥	女	27歲	原籍澄海

首先，通過《方言調查字表》的聲韻調系統字音調查，加上本文製定的二字組中的前字連讀變調字表的調查，我們得出巴冬潮汕話聲調系統如下：

表二 巴冬潮汕話聲調系統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本調	33	55	53(21)	35	212		21	2	5
	梯、燈	題、棉	體、等	弟、坐	替、意		第、面	一、得	石、滅
變調	33	21	35	21	53	55	21	5	2
	飛機	時間	點名	是非	菜刀	報名	夏天	國家	學生

上述聲調系統中值得注意的是，陰去和陽去有合併為[21]的趨勢，即許多陰去字的曲折調型[212]已基本簡化為低降調[21]；此外，陰去的連讀變調呈現出二種調值並存的疊置現象，即揭陽方言的[55]調值與澄海、潮安方言的[53]調值共現為自由變體形式；只是應說明的是[53]調值是絕對多數形式，調查字表中僅少數為[55]調值；並且同時能預見[55]調值終將消失。

然而巴冬潮汕話聲調變異的最大特徵在其陰上調。首先，在單字音層一致讀作[53]調值，即揭陽系統的[21]調值受到澄海類型[53]調值的完全同化。其次，是本文所著重討論的陰上調值的一種特殊變異方式，即複音詞彙層二字組連讀系統中陰上字為後字時，其調值分化為[53]與[21]。因此上表中的陰上調類調值記作[53]（21）。

3. 陰上調的特殊變讀

巴冬潮汕話陰上調在後字位置上的二種連讀變調調值，表現出相當規律的條件分化。以下根據其中兩位發音人的調查結果列表如下：

表三 陰上字為後字的二字組調查結果

前字調類	例詞	發音人②	發音人③
陰平	辛苦	seŋ ³³ k'ou ⁵³	seŋ ³³ k'ou ⁵³
	風水	huan ³³ tsui ⁵³	huan ³³ tsui ⁵³
陽平	紅棗	aŋ ²¹ tso ⁵³	aŋ ²¹ tso ⁵³
	明顯	meŋ ²¹ hiaŋ ⁵³	meŋ ²¹ hiaŋ ⁵³
陰上	頂點	teŋ ³⁵ tiam ²¹	——
	檢討	kiam ³⁵ t'ɔ ²¹	kiam ³⁵ t'ɔ ²¹
陽上	部長	pou ²¹ tsiaŋ ⁵³	pou ²¹ tĩ ⁵³
	婦女	hu ²¹ nŋ ⁵³	hu ²¹ nŋ ⁵³
陰去	政府	tseŋ ⁵³ hu ²¹	tseŋ ⁵³ hu ²¹
	記者	ki ⁵³ tsia ²¹	ki ⁵³ tsia ²¹
陽去	飯碗	pŋ ²¹ ũa ⁵³	pŋ ²¹ ũa ⁵³
	樣品	ĩ ²¹ p'eŋ ⁵³	iaŋ ²¹ p'eŋ ⁵³
陰入	結果	ke [?] 5 kue ²¹	ka [?] 5 kue ²¹
	發表	hua [?] 5 pia ²¹	hua [?] 5 pio ²¹
陽入	罰款	hua [?] 2 k'uaŋ ⁵³	hua [?] 2 k'uaŋ ⁵³
	月餅	gue [?] 2 pĩa ⁵³	gue [?] 2 pĩa ⁵³

從上表可以清楚看出，「檢討」、「頂點」、「政府」、「記者」、「結果」、「發表」等字組都基本整齊地後字陰上調讀作[21]；而其餘都一律讀作[53]。正如上文所述，根據揭陽方言與澄海方言的原籍聲調系統來看，陰上調值[21]為揭陽方言原調值，而[53]則為澄海原調值。

按上述調查結果，從前字調類角度分析，陰上後字的[21]調值分佈於前字為陰上、陰去、陰入三種調類之後；其餘調類之後則為[53]調值。然而，仔細分析能發現，其二種變體調值的分佈並非單純以前字調類為分化條件，而實際上是其前字的調值高低；如此變異的結果就是二字連讀中的高低調值異化現象。

因此，巴冬潮汕話陰上調在方言接觸融合下所產生的變異形態是非常特殊的。首先，上表中陰上字作為二字組中後字的二種調值分化條件較明顯，即前字聲調為高降調[53]或中升調[35]則後字讀作[21]，⁵前字聲調為低降調[21]或中平調[33]則後字讀作[53]；這很顯然是一種音韻異化現象。結合陳寶賢（2010）對閩南方言「鄰接交替式」特徵的歸納，這裡可清楚看出「調頭」或「調尾」是否出現「高」因素所產生的調值異化現象。

其次，這種音變只存在於複音詞彙層，單字音層的陰上調值則只唸[53]；而且是在二字組的後字上出現變異，並非一般連讀變調所見的前字變調。再次，上表兩位發音人分屬原籍揭陽與澄海，但二人陰上後字的調值變異情況基本一致。

本文主張巴冬潮汕話的陰上調值特殊現象是經過方言融合之後又重新分佈為條件變體，這與馬來西亞漢語方言聲調接觸後的疊置層相互形成自由變體的一般現象有所不同。此外我們也能看出巴冬漁村潮汕話雖包含不同聲調類型的潮汕次方言，但經過百餘年的融合後目前已穩定為一種共同聲調系統。

為了檢驗這一種陰上調值特殊變異現象的普適性，本文一共調查六位不同原籍次方言與年齡層的發音人，根據時間詞「一點」至「十二點」進行調查——其中「點」為中古陰上調類字，作為時間詞的字組後字——其具體發音情況列表如下：

⁵ 據此，我們可以結合陳寶賢（2010）所總結果，認為其中分化條件是「高調」與「非高調」。而且其中的「高調」包括「調頭高」與「調尾高」。這樣我們就能解釋中升調與高降調同屬於「高調」了。

表四 六位發音人時間詞「一點」至「十二點」的調查結果

例字	發音人①	發音人②	發音人③
一點	iʔ ⁵ tian ²¹	eʔ ⁵ tian ²¹	eʔ ⁵ tiam ²¹
二點	li ²² tian ⁵³	dzi ²² tiam ⁵³	dzi ²² tian ⁵³
三點	sã ³³ tian ⁵³	sã ³³ tiam ⁵³	sã ³³ tiam ⁵³
四點	si ⁵³ tian ²¹	si ⁵³ tiam ²¹	si ⁵³ tian ²¹
五點	ŋou ²¹ tian ⁵³	ŋou ²¹ tiam ⁵³	ŋou ²¹ tian ⁵³
六點	lak ² tian ⁵³	lak ² tiam ⁵³	lak ² tiam ⁵³
七點	ts'eʔ ⁵ tian ²¹	ts'eʔ ⁵ tian ²¹	ts'eʔ ⁵ tian ²¹
八點	pueʔ ⁵ tian ²¹	pueʔ ⁵ tian ²¹	pueʔ ⁵ tian ²¹
九點	kau ³⁵ tiam ²¹	kau ³⁵ tiam ²¹	kau ³⁵ tiam ²¹
十點	tsap ² tiam ⁵³	tsap ² tiam ⁵³	tsap ² tiam ⁵³
十一點	tsap ² eʔ ⁵ tiam ²¹	tsap ² eʔ ⁵ tiam ²¹	tsap ² eʔ ⁵ tiam ²¹
十二點	tsap ² li ²² tiam ⁵³	tsap ² dzi ²² tiam ⁵³	tsap ² dzi ²² tiam ⁵³

例字	發音人④	發音人⑤	發音人⑥
一點	eʔ ⁵ tian ²¹	eʔ ⁵ tiam ²¹	eʔ ⁵ tian ²¹
二點	dzi ²² tiam ⁵³	dzi ²² tiam ⁵³	dzi ²² tiam ⁵³
三點	sã ³³ tiam ⁵³	sã ³³ tiam ⁵³	sã ³³ tiam ⁵³
四點	si ⁵³ tian ²¹	si ⁵³ tiam ²¹	si ⁵³ tian ²¹
五點	ŋou ²¹ tian ⁵³	ŋou ²¹ tiam ⁵³	ŋou ²¹ tiam ⁵³
六點	lak ² tiam ⁵³	lak ² tiam ⁵³	laʔ ² tiam ⁵³
七點	ts'eʔ ⁵ tiam ²¹	ts'eʔ ⁵ tiam ²¹	ts'eʔ ⁵ tian ²¹
八點	pueʔ ⁵ tiam ²¹	pueʔ ⁵ tiam ²¹	pueʔ ⁵ tian ²¹
九點	kau ³⁵ tiam ²¹	kau ³⁵ tiam ²¹	kau ³⁵ tiam ²¹
十點	tsap ² tiam ⁵³	tsap ² tiam ⁵³	tσα ² tiam ⁵³
十一點	tsap ² eʔ ⁵ tiam ²¹	tsap ² eʔ ⁵ tiam ²¹	tσα ² eʔ ⁵ tiam ²¹
十二點	tsap ² dzi ²² tiam ⁵³	tsap ² dzi ²² tiam ⁵³	tσα ² dzi ²² tiam ⁵³

上表結果清晰顯示，不同原籍與年齡層的發音人所表現出來的陰上後字變調模式完全一致，可見這樣的變異形態在當地潮汕話中是很穩定的。

本文主張這是基於方言間接觸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融合。首先，這樣的音變並不見於澄海方言最集中的中馬濱海地區的潮汕漁村（參見邱克威

2017b)），也未見於潮汕原籍的任何次方言中；其次，這樣的音變同時見於巴冬潮汕話各次方言的族群，並跨越不同年齡層。

至於這種特殊聲調變異的產生機制，本文主張包含二階段：第一、揭陽類型與澄海類型的陰上調值差異由於相互接觸而形成[21]與[53]二種變體疊置，其最初形態應與目前韻尾的-ŋ、-m 一樣，屬於自由變體；第二、陰上調的二種方言變體通過音韻異化作用，以複音節詞前字調高低為條件，分化為高調[53]與低調[21]二種條件變體。

第一階段是一般語言接觸產生疊置層較常見的音變模式，至少根據邱克威（2017a, 2017b, 2018）所調查的馬來西亞漢語方言聲調變異情況來看確實如此。巴冬潮汕話陰上調變異的特殊性在於第二階段的變異。本文分析其原因，也許是由於巴冬潮汕人群體中並沒有一個完全優勢的次方言群，因此不像在中馬或北馬的潮汕漁村那樣，以一個同鄉同宗次方言群為絕對主體所產生的接觸變異模式；於是發生疊置的二音系層形成彼此大略等勢的格局，陰上調的二種調值均得以並存，如此則為陰上後字在調值高低上提供了選擇，即為音韻異化作用提供了實現的可能。

不論如何，這樣的變異方式在閩南方言聲調變異中是較少的，完全的平行案例並不多見。陳寶賢（2010）所舉的一些「鄰接交替式」連調式與此有類似的方面，此外洪惟仁（2017）分析台灣關西四縣客語的去聲變異，也發現相似連調式。

台灣關西四縣話的去聲存在[55]和[53]二種調值變體，其中前者在二字組中後接降調，後者則後接升調；於是其結果同樣是一種二字組合中的調型異化現象，即「降調與降調之間具有不可共存的關係」。而作為其變異機制的分析，洪惟仁（2017）指出是方言疊置的結果：

去聲的[55]、[53]本來是不同方言的變體，台灣嘉應州系統的方言，如苗栗四縣腔去聲是高平調[55]，東勢大埔腔[52]、五華腔陰去[42]都是高降調，可見關西四縣話的去聲高平調與高降調的共存現象是不同方言疊置的結果，有趣的是，這兩個去聲變

體在末字時自由變讀，但在前字時卻變成具有異化作用的條件變體。

不過兩者的差別在於台灣關西四縣話中去聲異化的變讀出現於複音節詞的前字，而巴冬潮汕話陰上變讀出現於複音節詞的末字；但二者同為方言接觸的結果，其中兩個疊置的方言調型產生分工，納入異化作用的音韻操作而成為條件變體。

4. 結語

巴冬漁村潮汕話經過百餘年的相互接觸融合形成一個基本固定的共同聲調系統，其中最特殊的地方就是本文所分析的複音節詞中末字陰上調的變調。而且這樣的變調形式只出現於複音節詞，單字音則一律讀作[53]。

至於後字二種條件性變調調值的產生原因，本文主張是由於不同潮汕次方言接觸變異的結果。從潮汕方言的角度出發，我們上文已做過解釋。再由這種特殊變調的表現形式上來看，其中二種條件性變調調值雖然表面上為「協調調值高低」的現象，但其調值恰恰是源自於所接觸的不同潮汕次方言的二種調值類型，即屬於澄海、潮安的[53]，與屬於揭陽的[21]。因此，我們認為最合理的解釋應是，這是方言接觸下的變異結果，而非方言內部的自然變異。

此外，同樣屬於音韻的異化作用，巴冬漁村潮汕話陰上調值變異體現在後字的本調調值，洪惟仁（2017）所分析的台灣關西四縣話去聲調值異化的條件變體，則出現於前字變調，與陳寶賢（2010）提出「反映了協調調值高低的要求」的「鄰接交替式」相同。李小凡（2004）分析的蘇州方言連調式雖然也有後字調值變異，但卻未體現「協調調值高低」的異化現象。由此可見，巴冬漁村潮汕話的陰上調值變異體在漢語方言連讀變調類型與條件的研究上有其特殊性。

引用文獻

- 王洪君. 1999. 《漢語非綫性音系學》。北京：北京大學。
- 李小凡. 2004. 〈漢語方言連讀變調的層級和類型〉。《方言》1: 16-33。
- 邱克威. 2017a. 〈馬來西亞漢語方言聲調變異及其社會因素的調查研究——以霹靂州北部三個相鄰漁村的普寧話為個案分析〉。《海外華文教育》2: 258-267。
- _____. 2017b. 〈馬來西亞雪蘭莪洲濱海潮汕漁村澄海人方言音系比較分析〉。《馬大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5.1: 13-24。
- _____. 2018. 〈馬來西亞晉江話音系的建構——兼論馬來西亞漢語方言研究中的音系性質及其層級性問題〉。《南方語言學》13: 145-164。
- 林倫倫. 1995. 〈潮汕方言聲調研究〉。《語文研究》1: 52-59。
- _____. 2015. 《潮汕方言的歷時研究》。廣州：廣州暨南大學。
- 洪惟仁. 2017. 《台灣語言地圖集》（手稿）。
- 陳寶賢. 2010. 〈閩南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語言研究》2: 43-48。
- 劉俐李. 2002. 〈20世紀漢語連讀變調研究回望〉。《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 176-182，南京：南京師範大學。

邱克威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系

KiakUei.Khoo@xmu.edu.my

Dialect Mixing and Conditioned Variants in *Yin Shang* Tone of Chaoshan Dialects in Parit Jawa Fishing Village of Malaysia

Kiak Uei KHOO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The Teochew community in Parit Jawa fishing village of Johor Malaysia consists of descendants from Jieyang, Chenghai and Chaoan. Over more than a century of dialect mixing, the Teochew dialect of Parit Jawa developed a common dialectal tonal system. On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tonal system is the tone sandhi of the *Yin Shang* tone. At the lexical level, *Yin Shang* tone being at the hind syllable will exhibit two different tonal values, that is, when the front syllable holds a high-declining or mid-rising tone it reads [21]; when the front syllable holds a low-declining or mid-levelling tone it reads [53]. As such, the end result is a dissimilation effect in its tone sandhi pattern.

Key words: Malaysian Teochew dialect, dialect interaction, dialect variation, conditioned variation